

法国大革命缘何未剥夺小农土地 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邓 俊 康

(内江师范学院 政法与历史系,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1789 年 7 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既没有大幅提升农业商品生产力的必要性,又没有能保障该变革进行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没有成功进行该变革所必需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正是这些因素,使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在处理国内土地问题时没有复制英国圈地运动模式,而是让众多小农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以致法国资本主义农业在长时期内主要沿着富农经济道路发展。这无疑是符合 18 世纪 80 年代末法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农业;土地问题;小农;大农场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3-0112-07

在近代,英国圈地运动让其农业走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发展道路;而 1789 年 7 月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却让众多小农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致使法国资本主义农业在长时期内主要沿着富农经济道路发展。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不仿效英国圈地运动,也强迫小农与土地分离而发展近代大农场呢?对此,人们往往引用马克思及国内外史学界人士所谈论的法国大革命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原因来加以解释^①;同时,也有人引用一些学者关于葡萄栽培的生产特性的研究来阐释法国没有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的原因^②。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圈地运动在法国的适用条件,并从中寻求答案。为了弥补此缺陷,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存在与否的考察,说明大革命未进行该变革的缘故,以求正确认识大革命的土地改革举措,并公正地判定大革命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正确理解大革命后

法国资本主义农业所走的发展道路。

一 大革命前法国农业的商品生产力

法国大革命若要强行整合小农土地发展大农场,其首要前提必然是法国农业的商品生产力已到了非大幅提升不可的地步。那么,该前提是否存在呢?

据资料记载,1789 年 7 月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农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小农,他们占了谷物、葡萄生产者的 90% 以上^{[1]231};此外,还有少量的由富农等兴办的大小不等的农场参与农产品生产。在农场方面,大农场主要集中在盛产小麦的地区,不单数量少,其经营的土地总量在农业地里的份额也很少。相反,绝大多数农村土地则为小农们耕用着。以小农产区为例,据魁奈计算,当时法国耕种的约 3600 万亚尔邦^③小麦耕地中,由小农经营的土地就达 3000 万亚尔邦,而归大农场经营的土地仅有 600 万亚尔邦^{[2]15,52,42}。法国小农们耕用的土地量的巨大

收稿日期:2010-01-06

作者简介:邓俊康(1963—),男,四川仁寿人,讲师,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指导教师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许晓光教授。

优势及其在农产品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深刻地制约了大革命当局对土地实施大农场化改造。

国内外许多相关著述都谈到,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羊毛、蚕茧等农产品已多年在市场上一直处于短缺状态。每逢天灾歉收,农产品更加供不应求,粮食的价格水平也呈现出较高的上扬态势。如与1726—1741年相比,1785—1789年五年间法国小麦价格上涨了66%,黑麦价格上涨了71%^{[3]6}。然而,我们务必清醒地认识到,在大革命前,导致法国粮食价格升高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仅在1785—1789年间,法国就遭受了三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其中,1788年的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最大,它使得当年法国的秋收严重减产、粮食价格节节攀升,到1789年7月上旬,法国小麦、黑麦的价格分别提高了150%和165%^{[3]6}。如此猛烈的涨势当然会较大地抬高1785—1789年间小麦、黑麦以及整个粮食价格的平均水平。所以,大革命前,法国粮食价格水平的涨幅,主要反映了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相应地,受天灾破坏、庄稼歉收的影响,比平时更多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现象不过是农业的商品生产力被自然灾害扭曲后的写照,而非农业本来的真实的生产能力的反映。至于那些长期短缺的产品,并非是法国农业的主产品,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结果不是法国农业商品生产力本质的表现。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认为,国内外著述所指出的那些农产品供给市场不足和粮食价格水平上扬的情况,尚不能证明上述变革前提的成立。

由于最能真实反映农业商品生产力水平的是丰收后的农产品在解决市场需求方面的状况,而最能反映农业商品生产力本质的又是主产品在解决市场需求方面的状况,因而,要证明上述变革前提是否成立,还得考察大革命前法国农业的主产品在丰收后的市场表现。

1787年,奥尔良省级会议的成员们就说过:“法国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可以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麦类加工厂。”^{[4]37}此话道出了以小麦为中心的麦类谷物是法国农业的一大主产品。法国农业的另一主产品则是葡萄。不过,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小麦在法国北部产量高,葡萄则是在南部产量高^{[1]238,239}。

先就小麦来说,魁奈指出,“象法国这样的王国”,“小麦的种植远远超过它所能销售的数量”^{[2]18}。所以,市场的大小对法国小麦的销售具有

重要的影响。大革命前,据时人杜尔哥估计,国际粮食市场的流通量约为600万至700万担^{[5]18}。基于市场的流通量等于交易量、交易量等于需求量这一理解,杜尔哥的估算数字表明了国际粮食市场的狭小性。在当时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谷物的条件下,狭小的国际粮食市场能给予法国小麦出口的机会是不多的。这样,法国小麦的主体市场客观上只能是国内市场。

在国内市场,1789年前,每当丰收后,作为主产区的北方小麦在供应本地市场的同时,还跨地区流通,弥补商品粮不足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市场的差额,这就是所谓的“北谷南运”^{[1]239}。而在非谷物主产区的南部地区,通过发展葡萄、谷物的混种农业,“小麦消费主要依赖当地的收成”^{[6]224},其缺口部分则通过购入北方小麦来补充。在小麦的目标市场中,城市是其最主要的目标市场。大革命前,随着小麦丰收,各城市纷纷依托本辖区的供应,或再加上跨地区的弥缺性供应,来解决其所需的小麦。法国城市向国外求援,只是粮食歉收后的事^{[7]143-144}。价格方面,虽然1785—1789年间粮食价格的平均水平因歉收而有较大上升,但在其间的1786、1787年,小麦的丰收又使得市场上谷物价格陡然下跌,“到1787年价格低得令人失望”^{[8]327}。除了1786和1787年的低价位外,在1776—1784年,法国的粮食价格也处在“较低或稳定”状态^{[9]846}。城市的小麦价格水平是国内市场小麦价格水平的风向标。在最大城市巴黎,居民只有在连年遇到灾害时,才会苦于粮食昂贵^{[10]51}。这意味着其它年景则是粮食价廉。价格低廉的市场行情,特别是1787年价格过低的市场行情,集中显现了1789年前丰收后供应国内市场的小麦量,不单在各城市市场和各地区市场,而且在单纯从本地获取供应和在本地供应基础上尚需从外地补给的市场上都获得了足够消费用的供给,且供给量大于需求量。

为了摆脱丰收后国内市场供过于求和价格低廉的不利局面,法国部分地区想方设法地将余粮输往国外,争夺国际市场。如勃艮第地区,经由索恩河和罗讷河运出小麦十分频繁^{[11]399}。1787年,法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家谷物和食品出口占了产品输出总额的23.6%^{[12]128}。

小麦出口的事实及其在国内市场的表现证明,在大革命前的岁月里,丰收后的法国农业供给市场

的小麦,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后尚有盈余,而且在不大的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再来考察法国农业的另一主产品葡萄的市场表现。由于它通常被加工成葡萄酒来消费和交易,所以,葡萄酒的市场表现大体体现着葡萄作为原料解决相应市场需求的状况。大革命前,法国在国际上保持着葡萄酒生产的领先地位,其各种酒类产品行销于全欧^{[13]18}。然而,据法国经济史学家C·E·拉布路斯估计,18世纪的法国葡萄酒几乎90%为本土消费^{[14]35}。这既意味着其主体市场也是国内市场,又意味着仅有10%左右卖到了国外。行销于全欧的法国葡萄酒,仅有10%左右销到境外,反证出国际酒产品市场的狭小性。当然,法国作为一个葡萄酒生产大国,其10%左右的酒在并非广阔的国际酒产品市场上所享有的相对市场份额肯定是不小的。尽管有10%左右的出口和国内市场的保证,“1778年以后,丰收造成了灾难,葡萄价格跌了一半”^{[8]327};葡萄酒陷入滞销危机,酒价降至最低水平^{[3]98}，“达到了危机的程度”^{[9]851}。这凸显出既有的国内外市场不能满足法国葡萄酒对销售市场的需求问题。为了缓解葡萄酒供大于求的矛盾,1786年,法国政府不得不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牺牲本国工业利益来换取对英国扩大葡萄酒输出。伴随着1787年英法贸易条约的生效,法国葡萄酒在保持原有国际销路的基础上,增加了输往英国的数量,这才使“葡萄种植者的元气得到了一些恢复”^{[8]327}。可见,葡萄酒所需的销售市场不足的问题至此也只是获得了初步解决。尽管如此,它和葡萄酒贱卖事件一起,却充分揭示出大革命前法国农业丰收后供给酒市场消耗用的葡萄,在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后绰绰有余,还能保障其酒制品进一步增大出口,占领相对更大的国际市场。

在谈论葡萄及小麦的市场表现时,我们已经知道,到18世纪80年代末,它们所对应的国际市场依然是狭小的。在此条件下,作为法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小麦和葡萄在被用来解决市场需求时,只要它们满足了其主体市场——国内市场需求,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或能保障其加工制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分享到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其农业的商品生产力就应该被认定为符合当时市场发育水平的需要的。依据这一标准,结合法国小麦、葡萄在丰收后所交出的上述市场成绩单,结

论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在未被自然灾害扭曲的状态下,农业在主产品方面的商品生产力,完全符合当时市场发育水平的需要,且在葡萄方面的商品生产力还有过剩,这就说明大革命前的法国农业即产品生产主要靠小农进行、另有少量农场参与的农业,虽然已有一些不足,但其正常的商品生产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当时市场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本部分所指出的大革命要强行整合小农土地发展大农场的先决条件之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如果仍要强行整合小农土地发展大农场,只会使得土地变革成为无谓的且会伤害农业正常运作的变革。所以,大革命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大农场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尚缺乏大幅提升法国农业商品生产力的市场需求这一必要性。

二 法国土地变革的领导力量

前面已经谈到,大革命前法国农村的多数土地皆被小农们耕用着,小农的小土地经营在整个农村土地经营方式中保持着绝对优势^{[15]16}。出现此种局面,一方面与地主(天主教会、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的土地经营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与小农中的一般纳赋农纷纷占有小块永佃田的状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土地占有结构中,除5%的农村公社公共地外,天主教会占有全国土地的10%左右,贵族占有25%左右,资产阶级地主通过购地也占有25%左右,而纳赋农(含一般纳赋农和分化出的富农,各自占有数量不等的永佃田)占有全国土地的35%左右^{[3]31}。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纳赋农的永佃田同富农的永佃田一样,都是世袭的,不可以随意加以夺取,“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出售或耕种”^{[9]776}。而包括一般纳赋农在内的所有小农,又是大革命前法国各阶层中人口数量最多的阶层——当时全国大约2800万总人口中,农民占85%^[16],约为2380万,其中小农占农民的89%^[17],达2100多万。无论是一般纳赋农,还是其他小农(无永佃田的小佃农),他们的宿愿便是获得真正归自己所有的能用来解决其生存的小块土地,他们坚决“反对以‘圈地法令’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3]33}，“反对大规模租地的扩展”^{[10]75}。小农们的这些情况与意志,决定了任何企图夺取其耕用的小块土地而改为它用的变革,都必然会遭遇来自他们尤其是一般纳赋农的很大阻力^①。因此,大革命要强制推行小农土地的大农场

化改造,只有具备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才能保证变革的进行。

大革命前,受英国圈地运动所产生的良好效果的刺激,法国局部地区也曾出现过一阵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小小风潮,国内也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宣传此道路的重农学派^{[3]36},以及庇卡底、东诺曼底、布里、博斯、巴黎盆地等盛产粮食的大面积耕作区的大佃农^{[3]32},当然也包括圈地用于大农场建设的地主等。这些地主,在重农学派的鼓动下,赞成和支持将土地的分散经营变为规模化经营,同时,其自身“兼并后的土地一般租给‘大佃户’经营”^{[18]219}。那些大面积耕作区的大佃户,即大佃农,从其个体上看,“无论是他的经济作用,还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表明他是资产者”^{[18]220};从其整体上看,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农村资产阶级’”,“是粮食产区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倡导者”,“都积极要求农业资本主义化”^{[3]32,452},即资本主义大农场化。至于法国重农学派,是兴起于18世纪50至70年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重农主义者认为,法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应该得到改造和改善”,“应该以地租制和大规模耕作承包制取而代之”^{[18]217}。因此,他们力推合并小农土地并租给大佃户即农场主,让其按照资本主义大农场方式来经营。不过,随着该学派创始人魁奈于1774年去世,该派重要代表人物杜尔哥于1776年被免去政府财政总监一职,以及杜尔哥依据重农学派所推行的社会改革被取消,重农学派迅速走向瓦解。不仅如此,由于大革命前“大农场在法国尚不多见”^{[18]229},进行圈地用于大农场建设的地主人数自然是少数人;至于大面积耕作区的大佃农,其人数也不多^{[3]32},且他们经营的全部土地之和在全国土地总量中的比重又太少(这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证实)。所以,法国到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国内真正要求和赞成走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的,只有少量的地主和农场主,其力量可谓势单力薄。

与少数地主拥护将小农土地用于发展大农场并身体力行不同,到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的多数地主则继续坚持着传统的土地经营方式。在天主教会方面,上层僧侣攫取了教会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大都居于宫廷^{[3]15},“无所事事、虚饰浮华和唯我独尊”^{[9]778},不思进取,且反对资产阶级^{[3]15,16}。在贵族方面,面对其18世纪末“常常入不敷出”^{[3]12}的困境,

他们中若“有一个敢作敢为和敢于革新的贵族,就有十至二十个贪图安稳、坐吃地租甚至麻木不仁的贵族”^{[19]309},“为数众多的乡居贵族和宫廷贵族只想以不断加强和明确其特权来获得拯救”^{[3]12},“他们谈论起土地来,通常也只是意味着雇一个管家,由他把土地租出去,有时租给自耕农,更经常的是租给分成制佃农”^{[9]774}。在资产阶级地主方面,他们购买土地的主要动机是提高其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社会地位的标志”^{[3]22}),“进入贵族阶级”^{[20]376}。当他们购得土地后,“占有土地和迟早总能增加的领主权力给予了他们尊敬,为他们准备了授爵”^{[4]158}。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关心也无兴趣改变土地的陈旧经营方式(大革命前他们中将土地用作大农场经营的人只是极少数^{[1]275})。由于这些因素,所以至1789年7月时,多数资产阶级地主和大部分贵族直接占有的土地,跟多数地区教会所占有的土地一样,照旧被分成单独的小块,且主要以分成制方式分别出租给小农耕种,以至于“法国2/3或3/4的地区实行分成制地租”^{[3]32}。多数地主继续实行小租佃经营的方式及原因,反映出他们依旧不愿意将其土地用于发展大农场。

多数地主不愿意将其土地用于发展大农场,要求和赞成走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的地主和农场主只是势单力薄的少数人,这就说明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对小农土地实施大农场化改造的领导力量是非常弱小的。面对2100多万捍卫自身土地权益的小农,大革命要把小农从土地上驱赶出去来发展大农场,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大革命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大农场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当时的法国还没有能保障该变革进行的领导力量。

三 法国非农业劳动力市场解决被分流农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结果表明,在一个小土地经营占优势的农业领域里,剥夺农民来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是会造成大量的甚至是多数的原农业劳动力成为剩余劳力而需要转移到农业之外的经济部门的局面。

本文第二部分已谈到,1789年,法国近2800万总人口中,小农阶层的人员就占了2100多万。可是,在他们中间,“大部分农民都未能充分就业”^{[9]774}。尽管葡萄农在为市场进行着商品生产,许多谷物农也在为市场提供着商品粮,但另一方面却

是许多小农“只有一小块不足以为生的土地”^{[3]32}，且这样的农民数目还在不断增加^{[9]776}，因而小农中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大革命前已表现得相当突出。

与此同时，法国农村还存在着一支时刻期待着农场雇佣工作的赤贫农民队伍。他们是150—200万失地破产农民^{[21]102}中的多数，无法脱离农村和农业。“他们时常失业”^{[13]22}，平时则“靠打零工和在农作物收割季节、葡萄收获季节打短工度日”，也靠农村公社的集体权利(包括共同放牧权、拾麦穗权、拾柴草权以及共同使用村社公共土地的权利等——引者注)获取生计^{[18]217-218}。特别是使用村社公共土地的权利和共同放牧权，使赤贫农民同少地小农一样，“依靠极易获得的收益好赖活下去”^{[4]243}。在农村的这些情况下，再在全国农村范围内逼迫小农与生产资料分离来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大农场必然要重新进行生产要素优化重组，且普遍确立起的大农场经营又必然会带来跟其经营不相容的除共同使用原村社公共土地权利之外的其它农村公社集体权利的消亡——虽然共同使用原村社公共土地的权利不会马上消失，但也可能象英国一样，因村社公共土地被农场侵占后所剩无几而不再带来什么生活价值。如此一来，其结果势必造成数百万有劳动能力的原小农阶层人员和部分原赤贫农民，既无法受雇于大农场，又无法继续呆在农村，只好离开农业和乡村。在当时法国其它行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主流趋势的环境下，他们只能转而依靠非农行业的雇佣劳动力市场去谋生和养家糊口。那么，非农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有这个吸纳能力吗？

法国非农行业的雇佣劳动力市场，早在13世纪便已出现。截至大革命前的历史时期里，它们在吸纳职业性雇员的同时，也雇佣着时间长短不一的农民散工。对少地和无地农民来说，除抢做农场短工外，争做非农行业的雇佣工人，包括零工和短工，也是他们获取生活来源的途径之一。不过，在18世纪的法国，包括在农场和其它各领域打工的临时性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工资劳动者仅为820万人，且其中的大多数人员还是农场短工^{[22]653}，所以，各非农行业吸纳的职业性雇员和农民短工的总量是相当少的。

在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方面，城市是其中心，它容纳了众多行业的多门类雇员。据阿尔贝·索布尔的

研究，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为主顾出力的雇佣劳动者可能是城市各人民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3]26}，他们中的许多人员来自农村和农民。而据前面所述的法国总人口数量和农民人数来测算，大革命前，法国城市的总人口约有400多万。两相比较，其中的雇佣劳动者，含来自农村的求职者充任的佣工在内，他们的绝对总量也是相当少的。雇佣劳动者在城市的分布上，“尽管在巴黎和纺织工业中心(里尔、里昂、特鲁瓦、色当、鲁昂和兰斯)人数众多”，但在“小城镇和传统工艺的故乡则是少数”^{[9]844}。

从行业来讲，工业是使用劳工相对较多的行业，大量史料也描述了农民在家兼做分散型手工工场劳动的情况，但在1781—1790年间，法国工业中雇用的人力仅有160万人^{[23]108}，可见其需要的雇工绝对量很少。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工业增长缓慢”^{[3]38}。正是由于该因素的存在，对从农村前去找工作的人来讲，要工业向他们新增很多就业岗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从150—200万失地破产农民的情况看，在农业劳动力市场不能保障其就业与生存的条件下，按理他们是最需要被非农业劳动力市场雇用的，也是最方便、最适合充当非农行业职业性雇工的人群之一，然而，他们中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21]102}而成为非农行业职业性雇员，大部分破产农民则不能重新选择职业，只好沦为赤贫农民。对法国农民来说，除务农外，其它则没有任何迅速增加的谋生机会^{[9]37}。

上述有关非农行业雇佣劳动力市场的不同侧面的材料，无不揭示出它们在大革命前的落后性：其劳工容量小，其能提供给来自农业或乡村求职人员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可被当作职业的工作机会非常少。在此形势下，如果农村用大农场经营取代小土地经营，那么非农行业劳动力市场则需要为破产失地农民新增就业岗位并吸纳大量的原本依靠农业就业的小农阶层人员的再就业，显然当时的法国无论如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既然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无力解决被分流到农业和农村的全部或多数劳力的就业问题，大革命如果硬要进行小农土地的大农场化改造，其土地革命所要遭受的巨大威胁和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大革命未剥夺小农土地以发展近代大农场的第三个原因，乃是由于当时的法国还没有具备成功进行该变革所必需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即

形成容量巨大的非农行业雇佣劳动力市场。

通过以上历史考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没有复制英国圈地运动模式,是由18世纪80年代末的法国国情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当时法国走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的时机尚未到来。正因为如此,在论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那种简单地将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与法国大革命实施农业改造后确立起的富农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并以前者为先进的观点,是不公正的;同样,那种

认为大革命未迫使小农与土地分离开来以发展大农场是保守性或不彻底性的表现的观点,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585}。法国大革命者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就遵循了马克思的“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注释:

- ①马克思在其《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中指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法国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在其著述中写道:法国“封建贵族顽固地反对革命,在长时间里阻止了资产阶级同它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农民,甚至向贫苦农民让步”,“如果农民群众保持被动消极状态,革命便不可能成功,资产阶级也不会取胜”(见阿尔贝·索布尔著《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2、30页)。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则指出:“富农经济是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革命……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见刘祚昌、王觉非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12-313页)。
- ②如巴林顿·摩尔便指出,在法国农民中没有引起类似圈地运动这样的变化,原因在于“葡萄栽培,……一种精耕细作的劳动。这样,劳动要求有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而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相对要小”(见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 ③亚尔邦(Arpent):法国旧的面积单位,约等于现在的30-51亚尔(are),或相当于20-50公顷。
- ④姑且不论一般纳赋农会不会将其永佃田与富农的永佃田相联系,也不论富农的永佃田该不该同一般纳赋农的永佃田一样加以剥夺,同时,也不谈论农村复杂的土地产权关系的确定问题。当然,本文并未将富农简单地纳入小农范围。

参考文献:

- [1]Duby, Georges, et Wallon, Armand,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Vol. 2* [M]. Paris: Le seuil, 1975.
- [2]魁奈经济著作选集[G]. 吴斐丹, 张草纫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阿尔贝·索布尔. 法国大革命史[M]. 马胜利, 高毅, 王庭荣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4]马克·布洛赫. 法国农村史[M]. 余中先, 张朋浩, 车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5]乔治·勒费弗尔. 法国革命史[M]. 顾良, 孟湄, 张慧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6]费尔南·布罗代尔.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M]. 顾良, 张泽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7]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1卷[M]. 顾良, 施康强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8]汉斯·豪斯赫尔. 近代经济史: 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M]. 王庆余, 吴衡康, 王成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9]A·古德温.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8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0]约瑟夫·库利舍尔. 欧洲近代经济史[M]. 石军, 周莲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11]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M]. 施康强, 顾良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 [12]Peter Kriedte.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18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3]马迪厄. 法国革命史: 上册[M]. 杨人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3.
- [14]巴林顿·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 拓夫, 张东东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15]See Henri, Eugen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 in France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M]. New York: Brimart Press, 1935.
- [16]雅克·戈德肖. 近十多年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与出版概况[J]. 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5, (10): 7-8.

- [17]张庆海.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107.
- [18]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册[M].康新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1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M].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 [20]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册[M].康新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21]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2]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Vol. 2* [M]. Paris:Flammarion,1970.
- [23]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杨慧玫,陈来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 [2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On the Reasons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 Not to Deprive Small-scale Farms of Land to Develop Large Capitalist Farms

DENG Jun-kang

(Politics, Law and History Department,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Neijiang, Sichuan 641112,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 not to deprive small-scale farms of land in order to develop large-scale capitalist farms are the absence of the necessity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oductivity greatly, of the leading force to guarantee the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necessary for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which cause the French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fter the revolution to make a right choice in line with the French national situations of the late 1780s, not to copy the British enclosure movement in dealing with the farming land issues but to allow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farms and eventually lead French capitalist agriculture to develop along a small-scale farm way.

Key words: French Revolution; agriculture; land issue; small-scale farm; large-scale farm

[责任编辑:凌兴珍]